

朝鲜—明“赋诗外交”中的用《诗》^{*}

—以《皇华集》为中心—

金秀炅^{**}

<目次>

1. 绪论
2. 《皇华集》的编撰与编撰意识
3. 对《诗经》体式的援用
4. 对《诗经》诗篇意象的援用
5. 文章中的引《诗》
6. 结论

1. 绪论

韩国在朝鲜王朝时期与中国、日本进行的外交活动极为频繁。朝鲜王朝定期派遣使节出使到中国(明、清两朝)以及日本。中国(明、清两朝)与日本也常派使臣到朝鲜。在这些外交活动中,往往少不了不同国家文人、学者之间的唱酬笔谈。使臣往往将出使期间的见闻感想、唱酬笔谈编成书。各种《朝天录》、《燕行录》、唱和集应运而生。其中,朝鲜曾编集明使臣与朝鲜远接使之间的唱酬内容,并对此加以序文,刊印成书,命名为《皇华集》。而与其它使臣活动的个人记录不同,其编集活动由朝鲜朝廷主管,反映了朝鲜对明—朝鲜间独特诗赋外交的

* 本论文是将2012年7月14日由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山西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庆祝姚奠中先生百岁生日暨东亚经学高端论坛”中的口述稿修改而成的。感谢匿名审稿人所提出的宝贵意见。

** 高丽大学 中国学研究所 研究教授。

重视。

人们注意到《皇华集》这一名称是从《诗经》中的篇名而来，并已明确指出《皇华集》与《诗经·小雅·皇皇者华》篇所描写的使臣意象之间的关联性¹⁾。其实，在朝鲜王朝之前，高丽朝亦用“皇华”来称呼从中国来的使臣²⁾。此可说明朝鲜半岛早已将“皇华”当作使臣之义。而人们除了《皇华集》的“皇华”之名与《诗经》之间的渊源关系之外，很少关注《诗经》在其中的具体运用。本文认为《皇华集》的编集本身以及其中收录的诗文唱酬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先秦编《诗》及“外交赋诗”作为模式的。因此本文拟通过分析《皇华集》中有关《诗》的引用与谈论，来揭示朝鲜与明外交唱酬、笔谈中所反映的对《诗经》的认识以及其对《诗》的运用特征。

2. 《皇华集》的编撰与编撰意识

(1) 《皇华集》的编撰

关于《皇华集》的编撰及其具体内容，已经有不少研究。本文参照现行研究³⁾，先简单介绍一下《皇华集》的编撰状况。

《皇华集》是收录明使臣与朝鲜远接使(或称接伴使)之间唱酬的诗文汇集。每当明臣来访朝鲜与朝鲜文臣唱酬后，朝鲜朝廷及时收集、刊行，并将此赠送给明

1) 申太永,《〈皇华集〉研究—明使臣如何看待朝鲜》,韩国:다운샘,2005年版,第43~46页;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鲜与〈皇华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

2) 例如《高丽史》卷三,《世家三·成宗四年》(982年):“(乙酉)四年夏五月,宋遣太常卿王著、秘书监吕文仲,来加册王詔曰:朕居域中之大以天下为家……是宜均洒泽以畴庸,遣皇华而锡命。”;《高丽史》卷十五,《世家十五·仁宗六年》(1128年):“甲戌,遣礼部侍郎尹彦颐如宋,上表曰:……臣属室家焚荡之餘,当军国扰攘之际,愧未遑於庆礼,辱先遣於皇华。”等。《高丽史》里“皇华”共见六次,皆指中国派遣来高丽的使臣。

3) 金垠廷,《朝鲜初期“事大外交”与《皇华集》刊行》,载《第九届韩国韩诗学会研究发表大会》第9辑,韩国庆尚大学南溟学研究所韩国韩诗学会,1999年;金己花,《〈皇华集〉的编撰与版本》,韩国庆北大学文献情报学博士论文,2007年。

使臣⁴)。《皇华集》最早编于朝鲜世宗32年(1450),最晚则编于仁祖11年(1633),其收录外交唱酬的时间范围长达180多年。当时,《皇华集》以明使唱酬的单辑汇集的形式刊印。单行本《皇华集》如今大多已经佚失。至于单行本《皇华集》的合集情况,在宣祖39年(1608),朝廷将1602年《(壬寅)皇华集》与1606年的《(丙午)皇华集》合辑、刊行,而在宣祖41年(1608)将其它十八种《皇华集》汇集、刊印。宣祖年间的合集本有江华史库、太白山史库、五台山史库、春秋馆藏本,但现在都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至于英祖49年(1773),将24种《皇华集》进行汇集整理、统一体例,并加以英祖御序的《御制序皇华集》,共二十五册五十卷。现行本主要有两种:一种是1993年韩国国学资料院影印英祖御序本《御制序皇华集》,另一种是1978年台湾珪庭出版社收集五台山本和其它版本的影印本,共二十三辑。本文以韩国国学资料院的影印本《皇华集》为参考标准。

参照明朝的统治时间(1368~1644)与朝鲜统治时间(1392~1910)可知,并不是所有的明使唱酬皆被编入《皇华集》。在明与朝鲜外交关系敏感或不稳定的时期,尽管有明臣来使朝鲜,朝鲜也没有进行《皇华集》的编撰。因此,我们可以推知《皇华集》的编撰时期即是明与朝朝之间保持友好外交关系的时期。

(2) 《皇华集》编撰者对先秦“赋诗外交”的关注

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春秋时期曾以《诗》的语言作为外交辞令的一个重要环节。特别是在春秋成公、襄公、昭公时期,选用《诗》中的某一首或某一章来表述自己见解的外交方式相当盛行,并形成了其独特的外交文化。这种赋《诗》言志活动使得先秦外交显得更为委婉、曲折,体现了其独特外交语言艺术的境界。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文化外交方式与后来的“诗赋外交”方式,虽然其具体操作不同,但它们在重视文化的外交意识上显得一脉相承。

4) 《朝鲜王朝实录》,世祖四年闰二月七日(1458):“先是,明使陈鉴、高闰来,颁正统皇帝复位诏,陈、高等凡所见杂兴,一寓於诗,合若干首,并本国人所和,印而赠之,名曰《皇华集》。其后中朝人因本国人赴燕京求之者颇多,輒印送之。”

可称作朝鲜—明“外交诗赋”汇集的《皇华集》，在几乎每辑前都附有序文，其序文中鲜明地阐述了其编撰意义。而序文描写《皇华集》的编辑意义时，往往与《诗经》的编撰乃至春秋列国外交活动二件事情连贯在一起，相提并论。这也体现了《皇华集》的编撰者希望其编集活动能起到《诗经》在先秦时期所发挥的作用的愿望。

古之有志当世者，未尝不讲《三百篇》，以穷夫六义之妙用。驰驱原湿，知政治之得失；讽咏樽俎，发善恶之劝戒，若吴之季札、郑之子产是已。⁵⁾

昔赵孟聘于郑，请郑之七子者，皆副议观其志，且以征其善恶存亡不爽。《左传》载其美以为善。⁶⁾

第一例是戊辰年(1568)金贵荣〈皇华集序〉中所提到的有关春秋吴国季札与郑国子产的故事。鲁襄公29年(B.C.544)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欣赏各诸侯国的音乐与周王室的舞蹈。季札后来聘问于郑国，见到郑国子产，一见如故，不仅赠送他缟带，还给予政治上劝诫。子产也献给他紵衣以答谢⁷⁾。这一段故事，后来被誉为通过外交关系结成友谊的美谈。第二例是癸酉年(1633)李敏求〈皇华集序〉中所提到有关赵孟聘于郑的故事。赵孟聘于郑，见鲁襄公27年(B.C.546)。晋国之臣到宋国参加“弭兵之会”后，在回国途中，路经郑国，郑简公设宴招待晋国赵孟一行人。宴享之际，赵孟请郑国七位大夫赋《诗》言志，以借此“观七子之志”⁸⁾，即想通过七位大夫的赋《诗》来了解郑国的外交立场。《皇华集》编撰者向往先秦外交模式，这就意味着他们在明—朝鲜外交关系上会寻求相互礼待的文明外交，从而尽可能地实现春秋时代的理想外交形式。

5) 金贵荣，〈皇华集序〉，《皇华集》第四册卷三一，第548页。

6) 李敏求，〈皇华集序〉，《皇华集》第六册卷四八，第343页。

7)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67页。

8)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34、1135页。

(3) 《皇华集》编撰者对先秦“采诗”、“观风”的关注

先秦两汉文献中往往可以看到将“采诗”、“献诗”、“陈诗”作为先秦时期体察民风的方式的叙述⁹⁾。“献诗”、“采诗”、“陈诗”之义大致相同，皆指采集诗歌给天子欣赏，有助于天子了解民风的意思。但若要从其在这个文化活动中所充当的不同角色来看，我们可以说：“采诗”是从天子派遣到民间采集诗歌的使臣的角度，“献诗”则是从诗歌创作主体乃至将诗歌献给天子的角度，“陈诗”则是从将诗歌配上音律供天子观赏的角度而言的。

《皇华集》的几乎每一篇序文里皆指出“采诗”、“观风”的作用。朝鲜朝廷编《皇华集》时，尽可能收进明臣唱酬作品，若有遗漏，后来再补¹⁰⁾。所以收录明臣唱酬与朝鲜远接使作品的《皇华集》，与先秦时期采集民间歌谣的方式相比，性质上有很大区别。而序文之所以不嫌繁琐地提及它，其真正的原因似乎不在于强调其能够体察国情的作用，而在于编撰者希望《皇华集》能够获得像《诗经》中《国风》或《鲁颂》（乃至《商颂》）一样的地位的意愿。

若夫采诗置官，王者所以观风俗、考得失也。然而有天下之作，有一国之作，有周之盛，有《皇矣》、《大明》之雅，而圣人采之，不遗乎《曹》、《桧》之风。吾东方藐在荒服之外，因是编之行，而得列于皇明风雅之末，使天下后世知东方之有国，亦得渐濡于皇明声教之中也。¹¹⁾

古者，王人下聘列国，非但宣上德而达下情，必询风采谣，贡于朝廷，荐之乐歌，如国风之系二南，鲁颂之续周雅，岂不韪歟！¹²⁾

9) 《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26～328页）；《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页）；《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10) 《承政院日记》，仁祖四年九月十八日：“（金）瑬曰：天使乘船之日，送诗扇于臣，使达于殿下，臣即付通事，使之封裹，而不为开见，故其诗，不得上於《皇华集》矣。似闻政院，有得见此诗者云。《皇华集》中，更为添入此诗之意，敢禀。上曰：知道。”

11) 鱼世谦，〈皇华集序〉，《皇华集》第二册卷十，第121～122页。

12) 金贵荣，〈皇华集序〉，《皇华集》第四册卷三一，第549页。

这样的想法，在《皇华集》中处处可见¹³⁾。他们抓住“采诗”这一行为将《皇华集》的编辑与先秦“采诗观风”联系在一起，为其给《皇华集》赋予《诗经》中一部分的地位，当作合理的理论根据。

而古代采诗的目的，是为了体察民情。采诗过程中，他们无法保证体察民情的结果全是赞扬德政的诗歌。也许是正因为如此，古代文化中采诗活动不一定与德治、仁政划等号。如《诗序》中的“刺~”、“怨~”的叙述乃至“周衰而诗作”、“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仪坏而《春秋》作”、“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等的观点，就表明采诗的结果好坏兼备。但若《皇华集》所收内容好坏兼备的话，就意味着朝鲜的政治好坏混杂。朝鲜朝廷无法接受这一逻辑，所以再采取升平时代就有升平之歌的说法。《皇华集》编撰者往往着重强调当时朝鲜社会在传承、恢复“诗教”。

臣窃惟诗之教大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所谓诗亡者，非诗之亡，诗之教亡也。……使盖相望，无非大雅之君子。其文光笔彩，前后交映，号为《皇华集》者，有一十有二编。间以吾东人酬和之什，实如周《雅》之后《商》、《鲁》二颂载焉。……观民风者若并以采录，则亦可见皇明达诗教于天下。¹⁴⁾

吁！诗之亡久矣。圣天子在上，以身为教，治源既正，四方风动。……而诗教之蔚与，乃於今观之，岂非幸欤！然则《皇华》之集，不但为东方之实，将永传於天下后世也必矣。¹⁵⁾

将命之尘毕妙选一时之英，采掇风谣，不昭恩德，咳唾之屑积成篇帙，上自倪、马，下逮朱、梁，珠玑灿烂，辉映前后，间以东人攀和之什，有似《商》《鲁》颂之续周《雅》，此《皇华集》之所以作也。¹⁶⁾

13) 李承召，〈皇华集序〉：“使圣朝一视同仁之化，吾王畏天保民之忠，赫然炳耀于天下，可以被之八音，传诸万世。而东人之诗，亦得同垂於不刊，即《国风》、《鲁颂》列于三百篇之义也。”（《皇华集》第一册卷六，第293、294页）；金安老，〈皇华集序〉：“两贤诗文，岂但铿锵一时，炳耀海域，将继续《周》雅之正，被之八音，垂诸万世。东人之作亦将齿于《鲁颂》，庶几并列于三百篇之末。吁！亦幸矣！”（《皇华集》第三册卷十八，第109页）；申光汉，〈皇华集序〉：“使盖相望，无非大雅之君子。其文光笔彩，前后交映，号为《皇华集》者，有一十有二编。间以吾东人酬和之什，实如《周》雅之后，《商》、《鲁》二颂载焉。”（《皇华集》第四册卷二九，第436、437页）；沈喜寿，〈皇华集序〉：“而东人不腆之作，亦犹《商》、《鲁》二颂之系于《周》诗之后，使天下后世，皆知我朝鲜获被文明之圣化，出于寻常万万，岂不大幸矣乎！”（《皇华集》第四册卷三一，第549页）

14) 申光汉，〈皇华集序〉，《皇华集》第四册卷二九，第435~437页。

15) 郑唯吉，〈皇华集序〉，《皇华集》第五册卷三五，第151页。

上面所举的申光汉与郑唯吉的序文中，皆将春秋时期的“诗教亡”与朝鲜当时“诗教之蔚与”、“皇明达诗教于天下”的情景一起对比，折射出《皇华集》编辑者要继承诗教的使命感。

需要补充的是，除了《皇华集序》以外，我们还可以发现明使唱酬作品中的“采诗”、“观风”。如唐皋云：“采诗我且带还朝，赢得咨询无寸效”¹⁶⁾，龚用卿云：“周官采诗以观民风，虽闾里细民无间也。予天朝之使臣也，以询采为职，行将采此一国之风，以陈于明廷列于瞽师，以昭圣代之盛治，是乌可不张之一言！”¹⁸⁾明臣在唱酬文中说自己“采诗观风”的职责，朝鲜文臣也同意。但明使臣的“采诗”职责在朝鲜—明外交关系上更多地只是象征性的。我们看《诗》的编撰过程，周臣到列国采诗，最终由周王室来搜集“采诗”、“献诗”、“陈诗”并撰成《诗》。再看明使臣与朝鲜文臣之间的唱酬作品。其具体“采诗”的活动，则由朝鲜朝廷担任，刊行《皇华集》。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皇华集》中的“采诗”里存在明使臣的“采诗”与《皇华集》编撰者的“采诗”之不同层次。

总之，若说明使强调“采诗”、“观诗”，是为了尽自己作为使者的责任，《皇华集》编撰者则要通过《皇华集》“采诗”、“观诗”，将《皇华集》的作用价值提升到《诗经》的位置上。《皇华集》序文里常常涉及的“采诗”、“观诗”的论述，与《皇华集》的编撰意图紧密联系在一起。论及《皇华集》的编撰意图，我们无法否认外交政策从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但我们同时可认为，其政治上的编撰意图就借用《诗经》时代的文化精神而获得的文学性话语模式来更有效地得以实现。

3. 对《诗经》体式的援用

《皇华集》作品中所运用的《诗经》体裁，最近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皇

16) 李廷龟，〈皇华集序〉，《皇华集》第五册卷四三，第39页。

17) 唐皋，〈题金孝女再用前韵〉，《皇华集》第二册卷十四，第394、395页。

18) 龚用卿，〈书《阳川世稿》序〉，《皇华集》第三册卷三二，第463页。

《皇华集》的文学价值>一文在谈《皇华集》作品所运用的体裁时，提及《诗经》体：“薛廷宠的〈瞻彼东方〉、〈江水〉是仿《诗经》体而作，苏世让次韵而和。”¹⁹⁾但该文对此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明代文臣出使朝鲜与〈皇华集〉》一文则从《皇华集》中的《诗经》体作品中择选四首并介绍其表述内容与句式特点²⁰⁾，而其分析主要针对个别叙述而言。本文拟就《皇华集》所见《诗经》体作品与《皇华集》编撰的关系进行分析。

目前，据笔者调查，《皇华集》中全篇采用《诗经》体创作的作品共出现十篇²¹⁾。虽然其数量不多，但其已足以体现《皇华集》中《诗经》体的特点。其不仅采用《诗经》的句式，还采用《毛诗》的编辑形式：除了两首对《诗经》体作品的次韵诗和题文后所附的《帝怀》一首以外，其它七首《诗经》体作品，皆带有“诗序”与“篇名○章。○章章○句”的体例。由此可窥见，《皇华集》的编撰者在收录《诗经》体唱酬诗篇时有意识地关注了其收载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将用《毛诗》编撰者的形式体例反映在《皇华集》中《诗经》体诗篇的收录当中。

《皇华集》中的《诗经》体作品，有借《诗经》体突出创作主题的，也有仅借《诗经》体加强抒情或描写情景的效果的。

首先，我们看《诗经》体的句式及诗旨皆与《诗经》有关的作品。如1567年正使许国在看〈高皇帝御制诗卷〉之后，运用《诗经》体叙述了其感怀。其内容如下。

帝怀之子，和鸣锵锵，维圭维璋，维东国之光。
 帝怀之子，锡以好音，维训维经，维东国之祜。
 帝怀之子，女游广陌，女珍女绮，推予衣食，之子稽首，荷帝之德。
 帝怀之子，匪予女私，光天之下，至于海隅，维风声是树，于时绎思。²²⁾

19) 王克平，载《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3卷第2期，2011年4月。

20) 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鲜与〈皇华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145页。

21) 据杜慧月统计，“《皇华集》中《诗经》体作品共9篇”(同上书，第142页)，有待商榷。

22) 许国，〈恭题高皇帝御制诗卷后〉，《皇华集》第四册卷三十，第516~517页。

这首诗所表述的是许国对中华文明惠泽四方的赞叹和骄傲。其内容类似于《雅》、《颂》中颂德的诗篇风格，适合采用《诗经》体。其运用“帝怀之子”句的重章叠句来加强明皇帝关怀朝鲜之意。而其“维圭维璋”、“维训维经”等“维X维X”句式，扩张单音节词形成四言的《诗经》体特点。且各章句数从一章四句到一章六句不等，并每章更换押韵，体现了其《诗经》体句式的特点。可以说，这首诗借用《诗经》体，起到了加强其诗旨的效果。

另外，《皇华集》中还有仅取《诗经》句式而不取《诗经》诗篇之意的作品。这种作品可属于《诗经》句式的化用。这类《诗经》体作品，常常引用《诗经》句子，但其引用之意往往与《诗经》背景中的意思无关，倾向于只援用其字面意义。

如1537年来使朝鲜的正使龚用卿，在游览嘉山岭时，看到“怪石棱棱欲坠”的景象，便创作《维石》三章。

嘉山岭下，怪石蹲立于旁无数，作维石三章
 维石岩岩，如虎斯雄，虎斯雄，不我从，胡为乎泥中？
 维石岩岩，有趯如兔，趯如兔，不我顾，胡为乎中路？
 维石鉴鉴，可以为错，东人取之，爰究爰度，彼美石兮，东方之石兮。
 维石三章二章章五句一章六句。²³⁾

篇名取自于诗篇开头的“维石”两字，即仿照了《诗经》编撰者取篇名的方式。龚用卿在描写嘉山岭的怪石，不仅借用了《小雅·节南山》篇“节彼南山，维石巖巖”、《小雅·鹤鸣》篇“他山之石，可以为错”等《诗经》中与石头有关的句子来描写嘉山岭石头的壮观。还援用了《邶风·式微》篇“胡为乎中路？”和《邶风·日月》篇“胡能有定，宁不我顾”等句。其中，“胡为乎中路？”一句，原来带着诗人怨恨、责问的口气，而“胡能有定，宁不我顾”之句，亦是带着沉痛的情调。《维石》的作者不取该句在《诗经》中的含义，只取其字面意义，将嘉山岭的石头拟人化。最后，诗人还援用《邶风·简兮》篇“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之句，将“人”换成“石”，以赞美嘉山岭之石。可见《维石》即集《诗经》之句来描写嘉山岭的怪石，侧重于借

23) 龚用卿，《维石》，《皇华集》第三册卷十八，第139页。

《诗经》诗句的字面意义来作为己用。

4. 对《诗经》诗篇意象的援用

《皇华集》不仅采用《诗经》的体式，还采用《诗经》诗篇的意象。从《诗经》中产生的典型意象丰富地运用在《皇华集》不同作品体裁中。本章节要就《皇华集》中频繁出现的《诗经》意象中的倾向性作简要说明。

(1) 有关使行与燕飨的《诗经》意象

朝鲜—明之间的外交唱酬中，最常见的《诗经》意象就是〈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的诗篇意象。位于《诗经·小雅》开头的这三篇是春秋时期用于燕飨典礼的乐歌²⁴⁾，“〈鹿鸣〉之三是周文王时诗，周公治礼作乐时所定。使后世使臣皆法文臣，故于聘、享、燕、射之时都歌之。”²⁵⁾在先秦诗、乐、舞不分家的时代，燕飨仪式主要采取诗乐的形式。写宴宾的〈鹿鸣〉、写征夫思妇的〈四牡〉以及写君遣使臣的〈皇皇者华〉，通过配音乐的过程，含有其“嘉寡君”、“劳使臣”、“君遣使臣”之象征意义。而进入诗乐分家的时代，《诗经》中的意象不再依靠音乐，而只靠文字之义独立沿用。获得其独立性的《诗经》意象贯穿历史发挥着其生命力。《小雅》前三篇则是其代表性例子。

《皇华集》中所运用的〈四牡〉、〈皇皇者华〉的意象主要用来描写使臣之劳的，如张宁〈渡大同江〉：“清尊且莫频相劝，四牡东风路渺茫。”²⁶⁾张城〈入平

24) 《仪礼·燕礼》：“设席于堂廉……工入，升自西阶，北面坐。相者东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卒歌，主人献工。”

25) 刘操南，〈《诗·小雅·鹿鸣》三篇阐义〉，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1991年3月，第14页。

26) 《皇华集》第一册卷五，第236页。

壤>：“四牡日趋驰，駉駉抵平壤。”²⁷⁾王梦尹<太平馆旧有张芳洲六十韵归途次之>：“皇华分得双旌宠，王事惭无四牡功。”²⁸⁾等。除了引用篇名来表示使臣之劳的意象，还常见引用诗篇中的诗句或词汇的情况，如“每怀靡及”、“载驰载驱”、“王事靡盬”、“驰驱原隰”²⁹⁾等属于其例。《皇华集》引用<四牡>、<皇皇者华>篇的意象，不管是引用篇名，还是引用部分诗句，皆表示使臣之劳。

与<四牡>、<皇皇者华>不同，<鹿鸣>篇的意象主要用于表示“宴乐有德的嘉宾”之义。如沈彦光<叨陪数日，属奉清尘。归辖将脂，不胜黯然。谨次张黄门登大平楼七言排律六十韵，呈两大人诗案，聊备行赆，伏希和教>：“鹿鸣几侍瑶池宴，鹭序争瞻玉树业。”³⁰⁾、许琮<次题葱秀山韵>：“知君才力真超常，早歌<鹿鸣>来帝乡。”³¹⁾等属于其例。除此之外，还有“式燕以敖”等<鹿鸣>篇中诗句来表示宴乐嘉宾之义的³²⁾。至于诗句“示我周行”的引用，是表示嘉宾接受对方的友善款待之后所指示的大道。其用例见于倪谦<叠谢珠玉之惠，敬赋此以酬，幸勿晒言辞之颯陋也。即日谦再奉冬卿良相执事>：“方感绮筵陪盛礼，累烦佳句示周行。”³³⁾与徐居正<次大平馆登楼赋韵>：“示我以周行兮，赠我以微言”³⁴⁾等句。

鱼世谦在<皇华集序>中云：“臣尝读《诗》至‘皇皇者华’，则知遣使之重；‘四牡騑騑’，则知劳使之切。且孔圣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为士之才，……而两公使乎之才，无让于<皇华>、<四牡>之大夫矣。”³⁵⁾这表明<皇皇者华>、<四牡>的

27) 《皇华集》第一册卷六，第329页。

28) 《皇华集》第六册卷四六，第256页。

29) 黄洪宪，<百祥楼次韩太史韵(归途作)>：“缥缈祥云瞻魏阙，每怀靡及促宵行。”(《皇华集》第五册卷三六，第234页。)；朴健，<次过八渡河韵>：“咨访也应怀靡及，皇华重为使华歌。”(《皇华集》第一册卷六，第305页。)；金安老，<皇华集序>：“故自前诏使之来，驰驱原湿，触览兴怀。”(《皇华集》第三册卷十八，第106页。)；徐居正，<白云>：“王事靡盬，有母不将。”(《皇华集》第一册卷八，第462页。)

30) 《皇华集》第三册卷十九，第263页。

31) 《皇华集》第二册卷十二，第257页。此外，还见高闰<沿途承陪绮席，兹已将闌，偶成一律赏答>：“谁道<鹿鸣>歌有德，任他红粉倚流苏。”(《皇华集》第一册卷二，第135、136页。)

32) 薛庭宠，<燕庆会楼赋(回程到碧蹄馆制送于殿下)>：“式燕以敖，我心舒兮。观风听乐，余有思兮。”(《皇华集》第四册卷二三，第19页。)

33) 《皇华集》第一册卷一，第25页。

34) 《皇华集》第一册卷八，第444页。

35) 《皇华集》第二册卷十，第120、121页。

意象在《皇华集》唱酬中成了“使臣之职”与“使臣之劳”。而《鹿鸣》的意象则在《皇华集》中用于表示宴享之义。由此可见，诗乐不分家的先秦时期《鹿鸣》之三篇，到了《皇华集》唱酬时期，主要以其诗篇的意义来运用。

(2) 有关“好贤”的《诗经》意象

朝鲜—明外交中还常见赞颂对方的文德，体现其“好贤”风格。其中常用的有关《诗经》意象有《郑风·缁衣》。《缁衣》篇在孔子“好贤如《缁衣》”³⁶⁾的言论之后，常作为“好贤”的象征。《皇华集》中可见于金安老，《皇华集序》：“我殿下又能尚文爱礼，罄《缁衣》好贤之诚。”³⁷⁾、郑士龙《昨承赠别之什，且喻和答，怀不自胜，谨步韵聊，叙下怀诗云乎哉》：“行尘灭没天垂诸，漫挹缁衣歌好贤。”³⁸⁾等作品中。《缁衣》篇好贤的意象主要通过“缁衣”篇名表现，有时与《缁衣》篇中诗句一起引用，如郑士龙《次重登风月楼韵》：“缁衣今改敝，莲烛旧传嘉。”³⁹⁾，即属于其例。《缁衣》的意象，不仅表示好贤的美德，还表示临别贤人（指使臣或朝鲜文臣）时的伤感。如申光汉《奉别华亭副使大人》：“秋鸿社燕难谋久，欲赋缁衣泪满巾”⁴⁰⁾之句，借用《缁衣》来表达惜别副使张承宪之情。但《皇华集》中所引用的《缁衣》诗篇意象主要集中在表现“好贤”的意义上。

若说陈述惜别贤人之情，《白驹》的诗篇意象更为常用。其例有柳根《次西垞老丈图示孤山隐居之胜，为赋长歌，兼致别意，开祀和教，以慰离怀韵》：“东民争欲留白驹，愿公旋旆少迟迟。”⁴¹⁾；沈连源《次馆下望广远楼设祖燕有作，次旧韵奉馆伴钱慰廉察三夫人都监二君子同览存韵》：“白驹明日知难繫，为尽清尊作夜游。”⁴²⁾

36) 《礼记·缁衣》，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22页。

37) 《皇华集》第三册卷十八，第108页。

38) 《皇华集》第三册卷二一，第415页。

39) 《皇华集》第三册卷二一，第383、384页。

40) 《皇华集》第四册卷二八，第427、428页。

41) 《皇华集》第五册卷四一，第584页。

42) 《皇华集》第四册卷二八，第388页。

等。除此之外，《皇华集》中还用〈白驹〉篇中诗句来表示“惜别之情”之例，如倪谦〈辱赋古辞为别，辄步严韵奉答〉：“素书可将兮毋金玉，尔音白驹杳渺兮多遐心。”⁴³⁾与权肇对此的次韵诗：“别后知相忆，毋金玉尔音。”⁴⁴⁾等，援用了〈白驹〉第四章“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之句。但离别的对象就是坐白驹的贤人，所以有时也用“白驹”表示“贤才”之义，如许国赞许洪司译时，就引“白驹”描写其人，其云：“青云失壮年，白驹局辕下。终当出鸡群，岂是悠悠者。”⁴⁵⁾

〈缙衣〉与〈白驹〉篇的“好贤”、“想留住贤人”的意思，在《皇华集》中常常并用，如苏世让〈次登大平楼赋韵〉：“适子馆而授子粲兮，想望其风流与文彩。何此欢之不可恃兮，驹皎皎而将去。”⁴⁶⁾；任权，〈次重登大平楼次韵紫阳先生六绝韵〉：“渭树想依依，客窗吟梦归。白驹苦难繫，只可赋缙衣。”⁴⁷⁾；郑惟吉，〈次国王饯别慕华馆韵〉：“授粲空教适子馆，繫驹何以挽行旌。”⁴⁸⁾等。笔者认为这两篇并用，就是在外交场合上的见面与惜别之间，自然形成的意象结合的结果。

(3) 对多种《诗经》意象的连用

《皇华集》唱酬作品援用《诗经》意象，往往有多种诗篇意象连接出现的情况。如1537年正使龚用卿〈登大平楼赋〉：“余乃揽皇华于原隰兮，驾四牡之駉駉。遵大路以逍遥兮，循周道之倭迟。”⁴⁹⁾在这四句全由《诗经》中的言语组成：〈皇皇者华〉篇“皇皇者华，于彼原隰”、〈四牡〉篇“四牡駉駉，周道倭迟”、〈遵大路〉篇“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其中，前两种属于在借用诗句的同时援用其在《诗经》中所反映的意义，后一种则属于仅用《诗经》诗语的字面意义，与《诗经》

43) 《皇华集》第一册卷一，第83、84页。

44) 《皇华集》第一册卷五，第255页

45) 〈洪纯彦赠洪司译〉，《皇华集》第四册卷三十，第538页。

46) 《皇华集》第四册卷二三，第10页。

47) 《皇华集》第四册卷二九，第474页。

48) 《皇华集》第五册卷三四，第117页。

49) 《皇华集》第三册卷十八，第112页。

意象没有紧密关系。1539年副使苏世让对华察〈登大平楼赋〉的次韵诗云：“……噫！普天莫非王土兮，任蓬转而萍浮。广咨询而怀靡及兮，匪从事于遨游，向北风而披襟兮，酌绿醪而忘忧。戏文墨于余事兮，散唾珠于青丘。兹乃皇恩之溥博兮，仁一视于五服。伊我邦世被渐化兮，谨事天而翼翼。皇览揆余之忠尽兮，申晋锡之宠光。是以吾东有此袞衣锡，荷隆私于包荒。蹇余陪侍乎杖屨兮，悦相接于宵寐。适子馆而授子粢兮，想望其风流与文采。何此欢之不可恃兮，驹皎皎而将去……。”⁵⁰⁾该赋的下一段就用了〈北山〉“莫非王土”、〈皇皇者华〉“每懷靡及”与“周爰咨諏”、〈蓼萧〉“既见君子，为龙为光”、〈緇衣〉“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粢兮”、〈白驹〉“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等五首《诗经》诗篇，以表达个别诗篇所象征的含义。可以说这正是《皇华集》外交诗赋话语中典型化了的《诗经》意象。换言之，《皇华集》所运用的《诗经》体式及句子在其内容上有着鲜明的倾向性，即使节活动、歌颂贤人、赞颂治平、礼物赠答等与外交场合上频繁出现的主题，倾向于借用《诗经》中的诗篇意象来表达。

需要补充的是，在朝鲜通信使与日本学者之间唱酬笔谈中频繁出现的赠答意象“木瓜”、“琼玖”⁵¹⁾，在《皇华集》中却明显地出现得较少。而其出现也集中在己亥年(1539)《皇华集》里薛廷宠与苏世让之间的唱酬作品中：薛廷宠〈登楼光亭次云冈韵〉：“木瓜谩费酬琼玖，曹桧何心较楚邦。”⁵²⁾；薛廷宠〈瞻彼东方〉“君子觐止，夷衷既愉，遗我乎琼琚。君子觐止，式燕且久，遗我乎琼玖。”⁵³⁾；苏世让〈次瞻彼东方韵〉：“我有嘉宾，我心则愉，贻我以珮琚。我有嘉宾，既敬且久，贻我以珮玖。何以报之，报之以椒兰。”⁵⁴⁾除此之外，在其它处出现的“琼玖”，大多属于不具有明显赠答之义的用例。对于朝鲜时期在“明－朝鲜”外交与“朝鲜－日本”外交中运用赠答意象的用例次数悬差的原因，本文认为：朝鲜通信使与日本学者之间的唱酬

50) 苏世让，〈次登大平楼赋〉，《皇华集》第四册卷二三，第13、14页。

51) 相关内容，参见金秀灵，〈通信使行笔谈、唱和中的引诗、论诗研究〉，载《韩民族语文学》第59辑，韩国：汉民族语文学会，2011年12月；金秀灵、金彦钟，〈朝鲜时期韩日、韩中外交笔谈、唱和中所反映的《诗经》意识与援用〉，《中国语文论丛》第53辑，韩国：中国语文研究会，2012年6月。

52) 《皇华集》第四册卷二四，第81页。

53) 《皇华集》第四册卷二七，第321页。

54) 《皇华集》第四册卷二七，第322页。

并不是正式规定的外交程序，大多由日本学者以个人身份向朝鲜通信使请求唱和或笔谈，故文中与赠答有关的《诗经》意象出现得多。与此相比，朝鲜远接使与明使臣之间的唱酬笔谈由朝廷安排，一般采取明使臣作诗，朝鲜文臣对此作唱和的形式。在唱酬已经成了固定形式的唱和下，使用赠答的意象来表示唱酬之感怀的情况就显得较少。因此本章节中没有另设小节对《皇华集》中有关赠答意象的援引进行分析，而只以补充形式附加在章节结尾。

5. 文章中的引《诗》

在《皇华集》中，《诗经》不仅被引用在诗歌的创作上，还被引用在文章上。而其运用在文章中时，往往以“引《诗》”的形式出现。本文所讲的引《诗》包括文章中引用《诗经》篇名或诗句之义，即采取广义的引《诗》之义。

下面是副使吴希孟献给中宗的〈奉国王书〉之一：

〈裳裳者华〉⁵⁵⁾曰：“左之右之，无不有之。右之左之，无不宜之。”言全才也。〈洞酌〉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能子民也。〈南山〉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光。”言尽臣节而增重之也。夫以有左右之才而尽子民之责，则其为邦家之光必矣。⁵⁶⁾

吴希孟，首先引用〈裳裳者华〉之句，言及具备全才的贤臣。据〈诗序〉与朱熹注说〈裳裳者华〉篇为“天子美诸侯之辞”，吴希孟在引用此篇赞许朝鲜贤臣的同时，有效地反映出作为宗主国的明赞许作为藩国的朝鲜的立场。后面，引用〈洞酌〉与〈南山有台〉，来赞颂朝鲜国王“多贤臣好治国”。该文属于通过引《诗》的方式加强自己逻辑的例子。

55) 原文误标为“桑扈”，故本文据《诗》原文改之。

56) 吴希孟，〈又奉国王书〉，《皇华集》第三册卷二二，第466、467页。

除此之外，还有的通过介绍《诗经》诗篇的特点作为自己逻辑的依据。例如在戊辰年(1568)成宪与王玺来使朝鲜所留下的唱酬作品极少，加上朝鲜文臣的次韵诗，也只是五十多首，李滉的序文就提及“<七月>之篇，多于<鹊巢>，岂病于多？<清庙>之诗少于<閟宫>，岂欠于少耶？”⁵⁷⁾其明明是为收录作品格外少的《(戊辰)皇华集》而作的辩解。李滉巧妙地援引《诗经》诗篇的字数参差的情况，来提出作品创作之多寡并不影响创作的的质量的看法。此亦可作为引《诗》来强加自己逻辑的例子之一。

《皇华集》中的引《诗》，除了加强自己逻辑的说服力之外，还具有从审美角度描写情感的作用。例如，有的明使臣，与其摆出其采诗观风的职责，不如表达其真情友谊。如丙寅年(1626)正使姜曰广与副使王梦尹往往引《诗》来表示他们对馆伴李廷龟的赞许与惜别之情。姜曰广<李月沙诗亭>云：“诗三百篇，声声可歌可咏，所以为盛世之元音也。若李君者庶几近之矣。《诗》曰：‘凤凰鸣矣，于彼高岡，言瑞应也。凤凰锵锵之鸣，中律中吕，谁为为之？感于其气然耳。’”⁵⁸⁾；王梦尹<寄馆伴李月沙书>云：“至于临别赠章爱重常怀，言寻悲切金石可销，此谊难泯矣。……‘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惟咏《秦风》终焉永叹。”⁵⁹⁾再如，李滉也引<豳风·九罭>篇来描写朝鲜民众与明臣之间的惜别之情：“挹公之清芬，老羸扶杖，至有涕泣者，何令人见慕一至于此，《诗》云：‘无以我公归，无使我心悲’，斯之谓也。”⁶⁰⁾通过这样的引《诗》来抒发感情，与直接叙述自己的感情相比，更具有美感。

6. 结论

韩国朝鲜王朝与中国、日本进行外交活动，往往少不了唱酬活动。其中，朝鲜

57) 李滉，<皇华集序>，《皇华集》第五册卷三二，第5页。

58) 姜曰广，<李月沙诗亭>，《皇华集》第六册卷四七，第313页。

59) 王梦尹，<寄馆伴李月沙书>，《皇华集》第六册卷四七，第328页。

60) 李廷龟，<皇华集序>，《皇华集》第五册卷四三，第42、43页。

曾收集明使臣与朝鲜远接使之间的唱酬，并加以序文，刊印成书，命名为《皇华集》。本文认为《皇华集》在很大程度上以先秦外交中的诵《诗》活动作为模范。虽然人们注意到《皇华集》的“皇华”从《诗经》篇名而来，但很少人关注其具体内容与认识特征，故本文要通过分析《皇华集》中的有关《诗》的引用与谈论，来揭示当时学者对《诗经》的认识以及其对《诗》的运用特征。

在《皇华集》编撰与编撰意识方面，考察了其特别关注先秦“赋诗外交”与“采诗”、“观风”的风气的特点。本文认为《皇华集》编撰者对先秦外交模式的向往与借用，意味着朝鲜王朝在外交上寻求相互礼待的文明外交。而《皇华集》在政治上的编撰意图，就借用《诗经》时代的文化精神而获得的话语模式来更有效地得以实现。

在运用《诗经》体式方面，《皇华集》中，不仅有借用《诗经》体式与诗旨的作品，还有仅取《诗经》句子的字面意义而不取《诗经》诗篇之义的作品。在援用意象方面，本文考察了《皇华集》中频繁出现的《诗经》意象：如有关使行与燕飧的意象、有关“好贤”的意象以及连用《诗经》意象等。至于礼物赠答的《诗经》意象，与朝鲜通信使唱酬集相比，《皇华集》里出现的明显地少，所以只在章节的结尾处略加涉及。除此之外，本文还指出了《皇华集》文章中所引《诗》句，主要用于强化自己逻辑的说服力和从审美角度描写情感两方面上。

总之，《皇华集》，明显反映了朝鲜与明之间外交活动对先秦赋诗外交的向往。其不仅体现在《皇华集》编撰者对先秦“采诗”、“观风”的关注上，也体现在外交参与者的具体唱酬内容上，还可体现在具有鲜明象征性的《诗经》意象的运用上。由此可见，《皇华集》充分体现了从春秋以来传承下来的东亚对《诗经》认识的。

< 参考文献 >

《国语》，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礼记集解》，孙希旦 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 注，中华书局，2000年。

《朝鲜王朝实录》，国史编纂委员会，网站数据库。

《皇华集》，韩国国学资料院 影印本，1993年。

金己花，〈〈皇华集〉的编撰与版本〉，韩国庆北大学文献情报学博士论文，2007年。

金秀灵，〈通信使行笔谈、唱和中的引诗、论诗研究〉，《韩民族语文学》第59辑，韩国：汉民族语文学会，2011年12月。

金秀灵、金彦钟，〈朝鲜时期韩日、韩中外交笔谈、唱和中所反映的《诗经》意识与援用〉，《中国语文论丛》第53辑，韩国：中国语文研究会，2012年6月。

金垠廷，〈朝鲜初期“事大外交”与《皇华集》刊行〉，《第九届韩国韩诗学会研究发表大会》第9辑，韩国庆尚大学南溟学研究所韩国韩诗学会，1999年。

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鲜与〈皇华集〉〉，人民出版社，2010年。

申太永，〈〈皇华集〉研究—明使臣如何看待朝鲜〉，韩国：다운샘，2005年。

王克平，〈〈皇华集〉的文学价值〉，《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3卷第2期，2011年4月。

刘操南，〈《诗·小雅·鹿鸣》三篇阐义〉，《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 국문제요 >

조선시대에 중국과 일본 간 외교를 진행할 때 필담·창화활동이 동반되었다. 본고는 그 가운데 明代 使臣과 조선시대 遠接使 및 문인 간의 창화활동 내용을 사행별로 엮어 序文을 달아 간행한 《皇華集》을 주요 분석텍스트로 하여, 《皇華集》에 반영된 賦詩外交의 편집·간행 상황이 先秦時代 外交 誦《詩》 활동을 전범으로 삼은 구체적인 양상을 고찰하였다. 기존 연구에서도 《皇華集》의 '皇華'가 《詩經》에서 유래한 면과 관련 성격에 관심을 보여 왔으나 그 구체적인 내용이나 인식 특징에 대해 심층적으로 분석한 연구는 드물다. 이에 본고에서는 《皇華集》 가운데 《詩經》의 원용 및 담론과 관련된 내용을 구체적으로 분석함으로써, 당시 학자들의 《詩經》에 대한 인식 및 《詩經》 원용의 특징적 면모를 제시하고자 하였다.

Key words: 《皇華集》, 《詩經》, 賦詩外交, 明使臣, 遠接使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3. 9. 23.	2013. 11. 12.	2013. 11. 22.	2013. 11. 26.	2013. 11. 30.